

西藏学研究在俄国和苏联

房建昌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办公室

1987.4

前 言

俄国关于藏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在世界学术界据有重要的地位。早自十八世纪二十年代俄国人在额尔齐斯河沿岸的一座寺院里发现藏文抄本后，俄国学术界就开始研究西藏，当时几乎没有一位学者能够阅读藏文，更没有什么藏语词典可供查阅，起步十分艰难，但是他们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编制藏文词典及语法，翻译藏文典籍，依据汉文史料编出了藏史概要，终于建立了自己的藏学体系。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普尔热瓦尔斯基，科兹洛夫相继闯入青藏高原，对当地自然地理、生物等方面作了考察。到了十九世纪末本世纪初，又有一批布里亚特蒙古学者进入西藏，搜集藏文典籍，撰写西藏风土志，由于他们能直接同藏人接触，既熟悉语言，又具备近代文化知识，所以收获颇大。十月革命后，苏联人进入西藏者很少，但学术界在整理藏文典籍上却取得了可观的成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藏学研究续有进展，至今研究者仍十分活跃。

本资料的编写者自1984年调来中心后，即专门从事于搜集整理外国关于藏族历史文化研究的情况资料。在工作进程中，他发现尽管俄国近三个世纪中藏学研究成绩相当可观，但国内甚至国际上对于他们注意得很不够，感到有必要将这二百六十年间俄国学者及著作情况作一介绍，这一课题提出后，得到领导邓锐龄同志的鼓励 and 大力支持，为之提供了一切方便条件。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编成了初稿。由于若干年来苏联学术界与我国的联系中断，近年情况不明；进口

2748/68
书刊分散收藏于国内大图书馆或研究单位中，搜集材料困难很多，即便在北京这个文献较为集中的地方，奔走借阅也必须费去大量时间，况且还须札记、译注、分类、排比，因此，在短时期内紧张地检披阅，只能力求做到重要的作者和论著不致遗漏，求全殆不可能。在著录书目时，手下即便借到原书，也没有足够的时间细加阅读，因之解题评注必然粗疏。但考虑到当前国内学术界要求迅速获得信息，而专家学者又苦于无暇搜采，此编虽然不免有缺点和错误，但能为研究提供线索，不为无益，遂决定付印，供学术界参考，并祈求指正。

初稿写成后部分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黄振华同志校阅一过，改写二稿后又请人民大学才达同志审阅全文，中心李立岗同志为书稿付印，做了大量工作，谨此一并致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办公室 1985年7月2日

苏联西藏学研究小史

绪 论

苏联的藏学研究是国际藏学研究的重要的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苏联的藏学研究乃从沙俄时期的藏学研究继承而来并有所发展。

苏联对于西藏的研究涉及西藏的历史（藏传佛教史，国外侵藏史，汉藏关系史）、地理（地名学、自然地理、历史地理、人文地理）、藏语（藏语动词、安多方言、卫藏方言、藏文、拉合尔方言、藏语口语、藏语在汉藏语系的地位）、宗教（本教、藏传佛教、蒙藏佛教关系，宗派源流、寺院建制）人物（政教名人及学者传记）、文献（藏译三藏【《丹珠尔》《甘珠尔》】、俄国旅藏学者携归的藏文文献目录、各大图书馆所藏藏文书目提要）、文学（《格萨尔》、《萨迦格言》、《仓央嘉措情歌》）、经济（社会经济关系、钱币）艺术（唐卡、绘画学）、考古（古器物与遗址）、民族关系（汉藏、蒙藏、羌藏、西夏国内的吐蕃人及吐蕃文化）、典籍（西藏历史文献学概要、《安多政教史》、《如意宝树》、《印度佛教史》、《青海史》、《西藏地理》、《布顿佛教史》、《青史》）、医学（《居希》、苏联研究藏医论著目录、藏医与藏传佛教的关系、藏-俄医学术语辞典）、藏-俄辞典，建筑等主要领域。在实地考察和探险上，俄国学者也作了许

多工作。

对于俄国和苏联的藏学研究情况，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西方和日本，都缺乏深入和系统的了解，因此有必要从目录学的角度作一番历史的叙述，以增进各国藏学界之间的相互了解，取长补短，共同前进。下面我根据手头所掌握的零星的和不完全的资料对俄国和苏联藏学的兴起、发展和初具规模以及现状的历史作一点粗疏的报导，以供有兴趣的同志们参考。由于各部分叙述的角度不同，因此难免有许多不一致和重复的地方，请同志们提出批评和改进的意见，以便有机会作进一步的增订。限于印刷和校勘的条件较差，请使用者务必核对原文。

俄国西藏学的兴起

据黎吉生近年的研究表明，从清代初年开始，亚美尼亚人就不断从印度进入拉萨等地经商，他们在拉萨设有固定的商行，从事贸易活动，当时商人的帐簿记载了这一活动。尔后，在西方旅藏学者的游记中也零零星星地记载了在西藏遇到俄国传教士的情况，有一个俄国使团还从印度穿过西藏向北京行进。

丘涅尔的《西藏志》、尤瑟夫的《西藏：自然地理概要》以及茹拉夫列夫的《俄国人旅行西藏高原史》则认为首位以旅行家身份到过藏族地区的是叶夫列莫夫(1750—1811)。他于1774—82年间曾经喀什、喀喇昆仑由拉达克入印度，1786年他发表了《漫游和奇遇》一书，该书以后曾多次再版，我们只见到了1952年的莫斯科版，易名为《九年漫游》，已经修订，其中有《西藏》一章，记载了他在拉达克的见闻所

及，属于游记性质，还谈不上什么研究。

1790年，彼得堡出版的一部文集中收入了加克曼的《西史地及自然状况报导》，此文我们未得寓目，对于作者的资料来源亦无从知晓。

1884年科别科在彼得堡出版的《文笔家学者必用品提供学会论文集》(385—398页)的论文中记载1792—1795年，一位名叫呼里桑夫的大僧正从土耳其经印度入藏，又从中亚回到西伯利亚，他说访问了拉萨，但他的旅行记颇多怪诞不经之处，如他说拉萨居民达一百五十万以上，并断言达赖喇嘛有三十万步兵和骑有两千头象的骑兵。话说得太玄，可信度就不大了。关于呼里桑夫类似记载的介绍也可参看奥登堡刊于《教育部杂志》(356、2、138页)的文章。

1972年，沃罗比耶娃—杰夏托夫斯卡娅和萨维茨基发表了《藏学》一文，其中主要介绍了列宁格勒的藏学研究，对于苏联藏学研究史也有概要性的叙述。据该文介绍，俄国的藏学研究最初发展于德国血统的学者，其中较早的是俄国科学院院士施密特(1833年当选，1779—1847年在世)，他生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早年曾在布里亚特地区进行调查和文献的搜集，并就此从当地的喇嘛学习藏语，因为藏语是当时的喇嘛教通用语。他的论著主要有：《中亚特别是蒙藏地区宗教、政治、文学和文化的研究》(彼得堡、1829德文、内言二十年代的蒙藏研究)，《藏文的首音》(彼得堡、1832德文，内言藏文应据基字排列，而不是据前加和上加字排列)，《藏语和藏文的特点》(彼得堡，1838，德文)、《藏语语法》(彼得堡1839、德文、俄文两种文本，沃氏认为该书布局周密，似参考了乔玛的著作)、《〈甘珠尔〉及其索引》(彼得堡1845德文)，《藏—德辞典：附德文词汇索

引》(1841德文,1843年出版俄文本,沃氏认为尽管叶斯开和达斯的辞典后来居上,但没有施氏大而全),《贤愚经》(1843、从藏文译成德文),《亚洲博物馆所藏藏文写本和刊本目录》(1847与鲍埃特林克合编)等。他还将蒙文的《蒙古源流》译成德文(1829),在注释中使用了《西藏王统记》的卡尔梅克文译本。

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俄国人通藏语,俄国人研究西藏最初是从汉文入手的,比丘林(1777—1853)是这方面的代表。他22岁为修道士,起了个教会名字:雅金夫。由于其对沙皇的忠诚,于1807年被任命为俄国东正教会驻北京代表团团长,次年抵达北京,他在北京居住达14年之久,他精通汉文,曾翻译了许多汉文典籍,还通满蒙诸语,但似乎并不懂藏文,他在中国期间曾搜集了大量的汉、藏、蒙文献。在藏人钦喇嘛的帮助下他从汉文编译了《西藏现状志(附成都至拉萨路线图)》(彼得堡1828),他还从甘三史及《通鉴纲目》编译了《西藏和库库淖尔(青海)史》(彼得堡1833两卷),时限为公元前2282年至公元1227年,还附有各时期的地图。

人们常以匈牙利乔玛的两部藏语著作(《藏语语法》、《藏英字典》)的成书年代—1834年为国际藏学研究的创始年代,而比丘林两部译著的时间比乔玛还早几年。如果说乔玛首开国外利用藏文资料研究藏学风气的话,比丘林可以说是首开国外利用汉文资料研究藏学的风气,二者各有千秋。只是俄文不如英文通用,故影响不及乔玛大,而且译著不如工具书使用价值大。但比丘林的译著对苏联的西藏史研究影响颇大。不仅在当时,即使在今天,比丘林的这两部译著仍是俄文读者接触汉文所载西藏史料的重要媒介。由于比氏的资

料出自汉人正统史家的手笔，所以导致苏联藏学家的某些采用了比氏译著的论著在观点立论上同汉人正统史家的通同一致。比氏为俄国藏学的兴起作了资料上的准备。由于他孜孜于学术研究，不热心宗教事务，所以回国后受到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法庭的审判，被监禁于彼得堡的一所监狱中。关于比氏的传记资料颇多，其中以克利夫佐夫的《雅金夫神甫》（1972—78）一书为最详。

伊拉利旺也是东正教驻北京代表团成员，他的《论汉藏关系史》（1853）乃译自魏源《圣武记》卷五及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七～十八，这篇译著在苏联至今仍被有关论著征引。

从十九世纪所发表的一些藏书目录——如廓瓦列夫斯基的《喀山大学图书馆所藏梵、蒙、藏、满、汉文书和手稿目录》（1824）及无名氏所编《亚洲司图书馆所藏汉、满、蒙藏、梵文书，手稿和地图目录》（1843）中可以看出当时俄国一些较大的图书馆中已有藏文收藏。

席林格（1786—1837）是位德国血统的俄国通讯院士，1830—1832年曾在东西伯利亚搜集蒙藏文献，几乎于此同时，乔玛正在拉达克从事类似的工作。席氏首先得知在恰克图附近的一座喇嘛寺藏有一些藏文经典，它们用红、黄封面包着被置于灵堂两侧，其中包括一套《甘珠尔》。这时有一个俄国教会使团正准备从恰克图前往北京，席氏请他们回来时顺便从北京带一些藏文佛典给这里的喇嘛信徒，他还开列了一个藏文书目，一个喇嘛对书目作了补充，俄国教士们表示愿意帮忙。为了取悦当地的喇嘛他还从附近的中国市镇上弄到了一些打击乐器送给他们，并对藏文佛经尊崇备至。当 he 从他们那里得到一套《甘珠尔》时，他小心翼翼地只接

触边缘部分，而不去摸上面的字。恰好准噶尔部首领有一部分《甘珠尔》，于是就送给了这位识货的欧洲人。席氏欣喜若狂，因为他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拥有这部藏文著作的欧洲人”。为此他将每卷《甘珠尔》都用丝绸包了起来，当地的喇嘛教信徒对此十分感动，从此他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人们的欢迎。正好前一年有人预言将有一个外国人改信喇嘛教并就此向西方传布，他无疑被当作应验中的这个外国人。布里亚特的喇嘛甚至将席氏视为“一个转世活佛、一座寺院主持的化身”。这些预言和推断为他带来了好的声望，特别是此时他将到蒙古去探查，这是有利的。后来他又组织了一个抄写班子，有时多达二十人，他在院子里搭了一个帐篷安排他们住宿，每天耗费一百磅左右的牛肉还有许多砖茶，有一口随时烧有茶水的大锅供他们饮用。一年后他已拥有了一套有蒙、藏两种文本的丛书了，其中包括两千多种论著。当他访向苏布林寺时，看到喇嘛们正在用土办法大批地制作经轮，于是他建议将这些反复印刷的祷文拿到圣彼得堡去用机器印，喇嘛当然高兴，为了表示谢意，他们以部落的名义将另一套从一个蒙古喇嘛搞到的《甘珠尔》赠送给席氏。双方对这场交易均皆大欢喜，因为当印好的卷子从圣彼得堡运来时双方各自获得了2500份神圣的条文，而且用红墨水印的字比用黑墨水印效率高108倍。另外同一种印刷字体比书法相异的手写字体看上去漂亮了。布里亚特人的喜悦是难以形容的。这位欧洲藏书家也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101卷西藏纳塘版《甘珠尔》。席氏故去后该丛书作为遗产由尼古拉大帝收购并转赠于科学院。施密特将这部《甘珠尔》目录编成索引后出版，后存入亚洲博物馆，列为席林格的藏件。由于施密特的努力，亚洲博物馆藏文写本和刊本的收藏量大增，其中包

括席氏1835和1848年搜集的两大宗藏文刊本三千余种。

科学院中继施密特而起的是席夫内尔(1817—1879)，他也是一个德裔，著书立说似只用德文，他的藏语靠自学而能，而不是从讲藏语的喇嘛学来的，同样他还自己掌握了研究藏文典籍的方法。他同时还研究印度学，在这一领域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论著。他的学术兴趣极为广泛，研究藏语语法、刊布藏文古籍、发表关于西藏历史和文献的学术论著，从事佛学及其佛典的研究，成就斐然。作为俄国藏学奠基者之一，他是第一个学无师承的自学成才者。

席氏与施密特有所不同，他并非从整体来论述藏语的语法体系，也无意编写藏语教科书。他主要运用欧洲的语言学理论去研究藏语中的个别现象。席氏的许多论文是阐述藏语语音学和形态学的，他最先论述了藏语的元音体系和辅音体系，提出了自己对藏语前加字的起源和功能的假设，其中许多看法到今天仍站得住脚，后起的研究者有的更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见解。席氏对于作为语法附加成分的藏语语气词的作用以及词的形态构造也下过一番研究工夫。

《十万龙经》是吐蕃时期赞普令人从象雄语译成藏文的本教要籍，席氏是国外第一位发表研究该经典论著的作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也是国外首位研究本教的学者。在席氏之后，除劳费尔外，再也没有人撰写专论《十万龙经》的论著，因为人们发现很难再作更深一步的论述，霍夫曼等人所著《西藏手册》将该文列为基本书目。

席氏出版过几种佛典(刊布全书及片断)、佛学辞典以及藏文有关佛教弘扬史的选集。他所著以藏文史料为基础的释迦牟尼传是他研究佛学的早期论著之一。他还组织出版了藏文典籍中的几部经文。与瓦西里耶夫同时，他将十六世纪

末至十七世纪初藏族僧侣多罗那它的《印度佛教史》从藏文译成德文。

席氏编纂的梵藏蒙佛学辞典取材于席林格携归的木版书，他十分注重《甘珠尔》和《丹珠尔》的研究，藏族学者对《大藏经》的贡献主要反映在《丹珠尔》中的因明、医学和语法著作中了，席氏对此尤为注意。他最感兴趣的还是《丹珠尔》中的藏传佛教文学题材，通过对这些题材的整理和注释，他编纂了源于印度的西藏民间故事集，由于这些民间故事经过了藏族人民的丰富和发展，所以更值得研究。这部著作当他死后方在伦敦刊布，作为一部优美的文学读物，不仅在藏学界，而且在世界文学研究者中都得到了高度的评价。1943年该书被译成日文。席氏还发表了一些研究佛教文学专题的论著。

由于席氏的努力，亚洲博物馆的藏文写本和刊本的数量大增，1848年对施氏等所编目录作了增补。

科学院不止一次地承担了地理学会组织的外国学者考察队语言调查资料的出版工作，席氏为筹备出版作了许多工作，从而使这些极珍贵的资料得以刊布流传，作为一种科研财富，它往往导致语言学中新学科的产生。

俄国藏学的形成与发展

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俄国的藏学研究逐渐起步，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藏学家，其中可以瓦里耶夫（1818—1900）为代表。他或许是俄国第一位通藏语的藏学家，他还通汉、蒙、梵、满诸语，甚至还通日、朝语及几种突厥系语言，他的藏学成就有赖于他的语言天才。他出身于一个小职员家

庭，1837年毕业于喀山大学史语系东语专业。1840年来到中国，在俄国东正教驻北京宗教使团工作，在此奠定了一生的事业。1851年任喀山大学教授，1855年任彼得堡大学教授，1866年当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和院士。他一生著述甚丰，有关藏学的论著主要有：《喀山大学图书馆中若干佛教史籍》（1855），《成吉思汗及其继位者年表》（1890此文取自西藏史学家松巴堪布《如意宝树史》中的资料，年表起讫于1027—1746年间，其中多涉蒙藏关系，但此文基于资料有限，故多为时间之考释、史实价值不大），《佛教及其教义、历史和文献》（圣彼得堡、1857）。他还翻译了两部藏文典籍，一部是多罗那它的《印度佛教史》（圣彼得堡1869）另一部是敏珠呼图克图的《西藏地理》（圣彼得堡1895，该呼图克图是北京雍和宫的掌印活佛，书中记述了他从西藏到内地的行程和沿途风光，是俄国学者所感兴趣的）。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现藏有瓦氏的几部未刊手稿，主要有：《西藏佛教史》、《佛教术语辞典》（谢米乔夫对该辞典有一篇介绍）、《松堪布呼图克图所编年表》等。有关瓦氏的传记及纪念论著很多，主要有奥登堡的《瓦氏是如何研究佛教的？》，《纪念瓦氏兼论其佛学论著》以及扎瓦茨卡娅的《瓦氏：俄国佛学的奠基人》等。

伊万诺夫斯基（1863—1903）的《用满文转写的藏文文献》（1895）一文对译自梵文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进行了研究，他附录了原件图影，并用俄文作了转写和疏释，该文对于了解满族接受藏传佛教文化的状况有一定价值。伊氏通汉、藏、满、蒙诸语，所以撰写此文颇得心应手。他1885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语系，1880—1901年游学中国，颇擅考据之学，尤致力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之研究，1887年以论

文《中国西南部的异族人》通过硕士答辩，1889年以论文《云南的异族人》获文学博士学位。他的两卷本《中国西南部异族人史料》（圣彼得堡1887—89）对于研究云南地区的藏族有一定价值。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俄国人对藏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出现了不少研究者并发表了一些论著和译著。1849年，布雷科夫发表了研究藏医治疗霍乱的著作的论文，其中探讨了医治方法，1857—58年，一位名叫尼尔的宗教领袖对外贝加尔地区的藏医进行了研究，并发表了两篇有关喇嘛医术的论文。

基里洛夫对于藏医的研究是令人瞩目的，从1889—1912年，他发表了不少研究藏医的论著，内容有探讨喇嘛和医生的关系的，有试图揭示藏医与喇嘛治病秘密的，有研究布里亚特喇嘛教藏医的，还有论述外贝加尔地区藏医特点的，他曾对藏医作为喇嘛教学说一部分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作了分析，对于研究贝加尔地区民间医学和藏医的意义、对于外贝加尔巫医和藏医的用药以及藏医和现代医学的关系他都作了不同程度的分析和研究，他还对藏医作了通论性的叙述，他认为藏、汉、蒙三地的医学不仅同属东方医学，而且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巴德瑪耶夫（1851—1919）1871—75年彼得堡大学东语系学习，1875—93年在俄国外交机构办理蒙藏事务，他对于藏医的研究颇有成就，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国际藏学界有一定的地位。1898年，他发表了成名作《论藏医体系》。1903年他发表了《藏医基本教课书〈居希〉》，这是他对《四部医典》前两部的节译，标为新译，冠有他阐述藏医主要内容的导言。他还发表了《藏医在俄国的地位》（1909）、等一

系列重要论著。关于巴氏的研究论著主要有谢曼尼柯夫编辑的《沙皇制度内幕，有关藏医巴德玛耶夫的文献汇集》（列宁格勒，1925）。布罗多夫斯基的《巴德玛耶夫——藏医与西方文明的联系》（华沙1932）以及古谢娃的《巴德玛耶夫大夫处方中所用藏医主要草药》（1966）有可能是研究巴氏在波兰行藏医的侄子的著作。

巴氏是一个布里亚特蒙古人，出生于布里亚特阿嘎草原一个有钱的牧主之家，后来跟随其哥哥来到彼得堡，为了猎取功名而改信东正教，并取教名“彼得”，还自认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为教父。他为沙俄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扩张卖了许多力气。1895年巴氏在彼得堡为培训布里亚特蒙古人办了一所中学。1895年前后，他在库伦开办了一所职业学校，以培养能在蒙藏地区活动的人材，著名布里亚特蒙藏学者崔北可夫本有志从医，但在巴氏的“劝说”下，并领取了数目颇高的一百卢布，才转入该校。

1892年8月，当维特由交通大臣改任财政大臣的时候，他开始为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而努力。他通过旅行中国时认识的乌赫托姆斯基认识了巴氏，但究竟是如何认识的，是乌氏提议还是巴氏提议就不得而知了（《回忆录》1卷39页）。他对巴氏的了解除了上述情况外，还知道他是位斯拉夫主义者，一个畜牧政治家，本是伊尔库茨克一所中学的学生。在外交部工作，同时兼任彼得堡大学的蒙语讲师，1875年开始行医，此后隐居彼得堡，同时仍与东方保持联系。当时维持计划的第一版虽然描绘了美好的前景，但却缺乏具体的内容，这正是维特所心感缺憾的。所以当1893年2月巴氏提出了一个荒诞不经的计划时，维特立即把巴氏抓在了手里。当然该计划并非为了维特。2月13日巴氏把一个很长的条陈交给

了维特，内言俄国在远东的当务之急。巴氏请维特将此条陈转交亚历山大第三世，并请维特把他研究藏医的成绩报告沙皇（沙皇对此亦兴趣盎然）。巴氏为此才巴结维特（该条陈及其主要文献见上引谢曼尼柯夫一书）。维特当即转呈，并附加了说明，但维特未提及藏医一字，也许是他认为这无关紧要，这就成了维特食言的口实（维特之报告亦见上引谢氏一书，转呈日可能为2月27日，因沙皇即日在条陈上作了批复）。巴氏的条陈从历史谈起，远溯至莫斯科立国时代，其思想之混乱与具体建议颇不对称。但沙皇对此条陈很感兴趣，使他惊异的是“其中所言皆如此新奇而虚幻，使人难以致信其会成功”。巴氏条陈言：西伯利亚铁路不仅应修到海参威，而且应该从贝加尔向南，深入中国一千八百俄里，一直修到甘肃的兰州。在当地应事先秘密组织一个蒙藏汉三族反清暴动政治中心。暴动后，由三族的绅商名流向沙皇呈一自愿请求接纳他们为俄国臣民的要求书。巴氏自愿承担这一工作，以便把“蒙藏汉之全部东方”和平并入俄国，他能指挥“数千”名边境上的布里亚特人，他可以把这些人扮成贩卖日常用品及兵器的商人以进行这项计划。维特“领会了该条陈的内容后”认为巴氏“发表了一些很重要的见解”，“在政治的实际问题上造成了一种新的观点，在目前具有特殊意义。因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不仅对俄国与东方的关系，即使对俄国与欧洲的关系……都有很大的影响”（见谢氏一书所载维特的报告）。但是维特以大斯拉夫主义的精神陈述俄国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在政治地位的加强时也曾忧虑到这样一种危险即：西欧的政策会鼓动中国人去反对俄国的侵略主义野心，“但如果巴氏的计划能够实现”，俄国的势力就能达到喜马拉雅，“从而控制欧亚”，他还组织了一个“巴德玛耶夫商业公

司”以实现这一计划，并借款二百万卢布，利息四厘，十年为期，沙皇批准了这一计划。于是维特开始了用国家公债经营“私人企业”的以和平方式达到“隐蔽的政治目的”的计划。但他后来发现计划的不切实际，于是“利用很多借口想扣留这笔借款。尽管巴氏应允“当流通资金达到一千万卢布时就一定归还”，但维特深知这笔钱是永无回还之日了。同时他也没有新的高招来满足沙皇好大喜功的欲望，也就只好任其自流了，（参加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62页以下）。

俄国对于西藏的了解最初主要是通过境内两支蒙古人开始的，即外贝加尔的布里亚特人和伏尔加河下游的卡尔梅克人（土尔扈特人），他们均信仰喇嘛教（藏传佛教），当地的喇嘛寺建制及所用佛经均与西藏地区通同一致，藏语是当地喇嘛的宗教语言，除用于诵读藏文佛经外，当地有文化的宗教人士还用藏文撰写了不少有价值的喇嘛教的历史和教义专著，包括一些喇嘛教名人传记。在他们心目中达赖和班禅喇嘛是他们奉为神明的精神领袖。他们对于西藏的宗教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和较强的理解能力。西藏在清代曾严禁外国人入藏，对俄国境内信仰喇嘛教的蒙古人则不加阻拦。这些蒙古人络绎不绝地往来于去拉萨的朝圣之路。还有不少人人卫藏、安多、康区各大寺学经，以保持同西藏在宗教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前面提到的崔比科夫曾受俄国皇家科学院和地理学会之命到西藏去搜集民族学和文献资料，为了掩盖其非宗教的科学使命，他就化装成一个朝圣香客于1899年11月—1902年5月来到拉萨等地，并撰写了《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彼得堡、1919）一书，从而揭开了俄国藏学史上新的一页。

自彼得大帝将其势力范围向东方扩张后，从十九世纪下

半叶又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西藏，对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沙俄政府采取了怀柔政策，国内的喇嘛诸寺均受到保护，并借此通过宗教途径来同西藏接触，据日人山县初男的《西藏通览》（东京，1907）295页记载，当时的甘丹、哲蚌、色拉及札什伦布诸寺常有多达二百余名的布里亚特学僧。可见当时布里亚特人在西藏活动范围之大。

在近代俄藏关系史上，布里亚特蒙古人德尔智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德氏的祖先属霍林布里亚特人的加尔佐特族，住在外贝加尔的库尔巴。关于德尔智的生年，各家说法不一。柏林的《阿旺德尔智堪布》一文言为1853年，舒尔曼的《历代达赖喇嘛传》（莱比锡1958年第2版373页）与多田等观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东京1965，38页）言为1849年。据英用蓝皮书《关于西藏文件》1920（1904，115页）载巴德玛耶夫就德氏赴俄事举行记者招待会时称1901年德氏为55岁，则为1856年生。寺本婉雅的《藏蒙旅行日记》（东京1974，291页）记1908年11月21日与德氏相晤，时年54岁，则为1854年生，柏林是位苏联俄藏关系专家，又是德氏唯一的一篇传记的作者，又掌握了第一手调查材料，故其说可从。

德氏19岁也就是1873年入藏，来到拉萨西面的哲蚌寺习经，1888年获该寺拉让巴格西的学位（格西为喇嘛教的最高学位，一个喇嘛须攻读完必修的《五部大论》，经答辩考试合格方可获此学位。格西分四等，一等为拉让巴），可见他对喇嘛教的研究有一定造诣。后来他成为达赖喇嘛的经师之一，深得信赖。由于西藏实行的是政教合一制度，所以他在政治上十分活跃。他荒谬地认定香拔拉就是俄国，以至当时有一些西藏人背井离乡去俄国寻找这个传说中的佛教极乐世界，